



翁礼华 著

千里河西

..... QIAN LI HE XI
L I H E X I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千里河西

..... QIAN LI HE XI

翁礼华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邹 亮

装帧设计 祝晓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里河西/翁礼华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8

ISBN 7-5339-1640-9

I. 千… II. 翁… III. 财政—经济史—中国—文集
IV. F812. 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8044 号

千里河西

翁礼华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印张 15.75 字数 393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40-9/I·1448 定价: 27.00 元



翁礼华，浙江临海人 1945 年生，1962 年进杭州大学化学系（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学习，1967 年毕业。曾任技术员、工程师、厂长、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奉化县、鄞县县长，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现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局长、浙江省国资办主任，为中共浙江省委九届、十届省委委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 年获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浙江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浙江省委党校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代赋税和当前税制改革》、《财政·赋税·官吏·俸禄——中国历史漫谈》、《五十而知天命——财税改革随笔》、《以经济视角面对历史——财税新视野杂谈（上、下）》、《礼华财经历史散文》、《长河东去》、《古今中外话财政》等 300 多万字的专著及其他诸多论文。其中《财政·赋税·官吏·俸禄——中国历史漫谈》一书获第三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历代赋税和当前税制改革》一书获 1997-1998 年度全国优秀税收科研成果二等奖，礼华财经散文在读书界具有广泛影响。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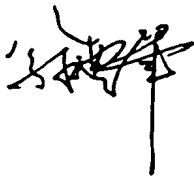
人们常说科学依靠逻辑思维把糊涂的东西搞明白,文学依靠形象思维将抽象的东西描绘得引人入胜。作为财经及其历史,无疑是一门科学,应该明明白白地走向大众,但由于它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又有很强的专业性,在财经界业内尚且有“财政学家必然是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却未必都是财政学家”的说法,更不用说社会上有更多的人难以理解这门与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科学。因此如何使仅仅只有逻辑思维内涵的财经科学插上文学这个形象思维的翅膀,飞往穷乡僻壤,进入寻常百姓之家,不啻是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诚如人们所知,一切财经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是地球上迄今为止 200 多万种动物中惟一具有思想的动物。凡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既有作为人的自我修养,也有作为高级动物的趋利性。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财经决策的关键,也是每一个凡夫俗子在利益面前不得不作出抉择的处世之道。因此用文学形式阐述财经及其历史,揭示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和经验教训,不仅是每个财经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人们如何以经济的视角面对历史,以文化的视角面对改革,以人为本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本书就是基于上述目的,在浙江省作家协会诸位同仁支持下

出版的第九本作品。前八本作品分别是《中国历代赋税和当前税制改革》、《财政·赋税·官吏·俸禄——中国历史漫谈》、《五十而知天命——财税改革随笔》、《以经济视角面对历史(上、下册)》、《礼华财经历史散文》、《长河东去》和《古今中外话财政》。由于这本书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河东去》的续集,故定名为《千里河西》,象征着我继续沿着财经历史长河“上下求索”的坚定信念。全书共17篇,涉及财经的有《千里河西》、《西出昱岭关》、《关山度岩飞》、《反客为主》、《万变不离其宗》、《凤凰寺里话丝路》、《几多难免》、《增值税的鼻祖》、《欺牛太甚》、《探究社保》等10篇,涉及人生的有《佛国春晓》、《古镇人生》、《寻归人生韵味》、《羁縻》等4篇,既涉及财经又涉及人生的有《千秋冤结一抔土》、《十年一觉扬州梦》等2篇,反映国家兴衰朝代更迭的有《问鼎中原》。

古人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何将枯燥的财经数字与形象的文学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既丰富多彩,又有学术价值,更有深刻人生体悟的文学形式,并非易事。尽管我孜孜以求,希冀兼容并蓄写就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财经散文,但愿望并不等于现实,由于才疏学浅,难免挂一漏万,离读者的要求仍然有明显的差距。因此,不揣冒昧的我,在此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直陈得失,以便集思广益,求得日后有所精进。



2002年5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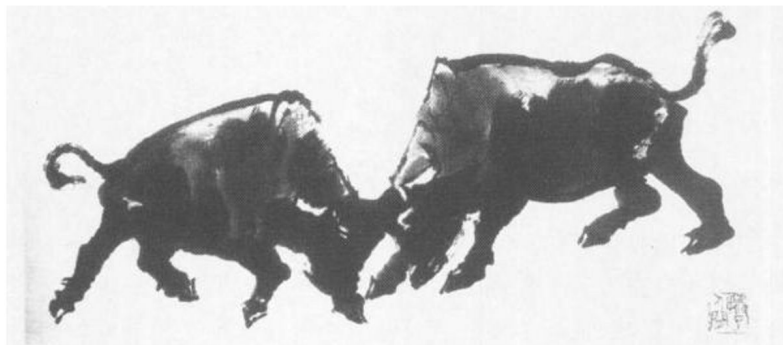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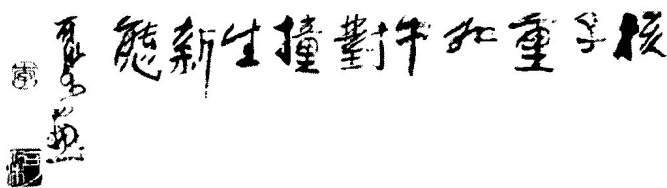
1	自序
1	羁縻
9	佛国春晓
20	古镇人生
29	寻归人生韵味
35	千秋冤结一抔土
73	千里河西
113	问鼎中原
156	反客为主
184	关山度若飞

198	西出昱岭关
237	十年一觉扬州梦
260	万变不离其宗
279	凤凰寺里话丝路
297	探究社保
324	增值税的鼻祖
362	欺牛太甚
398	几多难免
479	附录

羈 縻

古人将用以控制马行动的马络头称为羈,用以控制牛行动的牛缰绳叫做縻,两者合称羈縻,即控制牛马行为之意。牛马乃人类最早使用的畜力。牛在商周时用于耕田,使生产力有了成倍的提高,马用于作战,使战争发展到长途奔袭的新水平。牛有吃苦耐劳的筋骨,马有奔驰万里的体魄,故人们皆以“牛筋马力”盛赞牛马精神。当然牛也能作为交通工具,如道家祖师老子(又名老聃)当年就是骑牛西行,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县境内)为关吏伊尹所阻,被迫写下五千字的《道德经》后才得以出关,此后西去不知所终。东汉顺帝时,为发扬民族精神,抵御印度佛教侵入,张道陵在鹤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境内)创立了道教,他不仅以《道德经》作为其理论基础,还把老子作为教主,尊奉为“太上老君”,并发挥其非凡的想像力,称老子西去后到达印度,并收释迦牟尼为徒,从而使释氏有了创立佛教的知识基础,所以说道教是佛教的“先生”。这也许是中国人“阿Q精神”的肇始。

由于牛是农耕时代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历朝历代政府无不极尽保护之能事,私自宰杀耕牛者几乎都要被处以重刑。至于牛的崇高品德,更为历代文人所敬重,尤其是对牛异常敬仰的大文豪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写下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五十年后的广东省深圳市政府运用此联意境,在



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

政府大院内竖起了“孺子牛”的雕塑，教诲院内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像“牛”一样忠于百姓，为人民服务。从当年秦始皇号召百姓“以吏为师”，到今日深圳市政府号召官吏“以牛为师”，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马的作用更是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形容行动迅速为“马上”，形容人的才能独具为“马到成功”，形容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为“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形容老有所为的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于现代人所用的“马路”、“码头”、“马步”、“马力”等词语也无不与马有缘。牛马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典型，人们对生活之苦常用“牛马不如”来形容；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德行，清代郑板桥以“青藤门下牛马走”来表达其对明代徐渭（字文长、号青藤）才学的仰慕。可见牛马对于人是何等重要，在农耕社会简直是须臾不可离去之动物。正因为重要，就有一个联系和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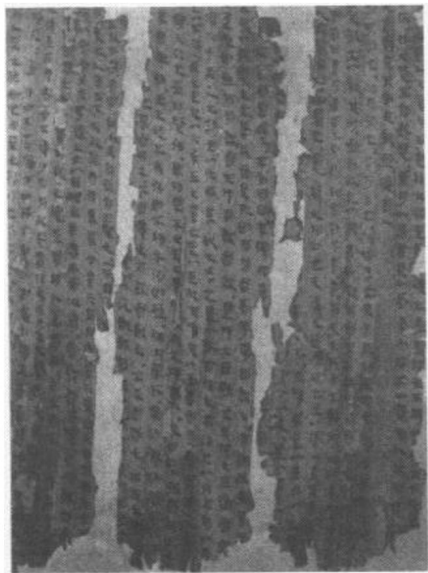
制的问题,人对牛马络的羁縻手段便显得必不可少。汉、唐的统治者将这种羁縻之法推广到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上,他们通过大量设置羁縻府、州使,“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羁縻政策的实质就是羁縻府、州既与中央保持隶属关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一是地方长官一般由其本民族首领担任,但必须由朝廷任免,凡“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二是允许地方长官按照传统的方式处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三是羁縻府、州无须向朝廷正式申报辖区户口和缴纳固定的赋税,但要接受所在边州长官的征调,遵守朝廷政令,并按规定向皇帝进贡以表忠心。所以说,羁縻政策乃中国“一国两制”政策之发端。

既然古代少数民族受中央政府羁縻,牛马受人羁縻,那么人又受谁之羁縻呢?由于人是利益的动物,其趋利性就决定了人必然受名利所羁縻。“利”是物质享受,任何动物对利益都会趋之若鹜,最典型的是当某类动物获得可口食物时,其摇着尾巴得意忘形的样子大概任何目睹者都不会忘怀,人又何尚不是如此呢?只不过人具有修养,表现得没有那么直观,而是更加含蓄罢了。如报载,有些接受了不义之财的官员,只要老板一个电话就随叫随到,比哈叭狗还听话。趋“名”则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点。有些人哪怕只要给他一个名义,他就可以不怕风吹雨打,拼命工作。若在他的职务后面加上一个括弧,就会感激涕零,为了求得相当于某某官衔的职称不惜日夜奔走,托人说情,以求一逞。在功利心炒得火热的地区,有人更是不



唐三彩陶马

惜出卖灵魂,甚至出卖肉体,以求名利。报载某地“三陪女”依靠与当地主要领导上床当了宣传部长,就是出卖肉体求名的典型。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动物超过 200 万种,人是其中惟一种有时间观念的动物,因此,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仁立在江河之滨,面对着奔腾而去的长河,想到岁月的流逝,不无感慨地说“逝者如斯夫”!三国



西汉帛书《老子》(残页)

时曹操更以“白驹过隙”来形容人生稍纵即逝的短暂。所以,追名逐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利是引导社会进步的动力,名是引导人们奋斗的航标,所以任何想推动社会进步的统治者都不会放弃名利这个可靠的导向杠杆,任何希冀有所发展的社会都不会忌讳谈名说利。但一旦有人不择手段、惟名利是图时,名利就成了控制人们思想和行动的马络头和牛缰绳,成了

羁縻人的名缰利索。一个人成名固然需要才能和勤奋,但偶然的机遇却往往起着很大作用,因而难中有易。如 1911 年武昌起义时,死活不愿担任鄂军都督的清朝新军协统(相当于今旅长)黎元洪被人硬从床底下拖出来就职,而且民国初年还进一步当了大总统,你能说成名很难吗?但保持盛名则不一样,经常发生的是经营一生,毁于一旦。因而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有“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的说法。如汪精卫年轻时参加革命党,怀着满腔热血追随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曾经置生死于度外,潜往

北京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迈诗篇,为人们称颂一时。然而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从著名的革命党人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成了民族罪人。说到物质利益,孔子有“富贵于我如浮云”之说,但“不畏浮云遮望眼”者几人?在参加他人遗体告别仪式时,哀乐声中有多少人幡然醒悟,但走出火葬场又有多少人不再坠入名利场中!

君不见在 20 世纪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有多少官员过不了金钱、美色、权力的名利关,伸手被捉,赔上了前途,失去了自由,以致丢掉了性命。有人说,酒具有“马太效应”,一类如唐代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开发了创作的源泉,而另一类如云南永善县乡镇企业局局长饮酒过度死于歌舞厅,酒真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可以使快乐者更快乐,赛过活神仙,忧愁者更忧愁,与死神交臂。名利亦然。它可以锦上添花,给人以鼓励和力量,也可能雪上加霜,成为束缚自己的名缰利索,区别盖在承载者的品德和才能,特别是品德起主导作用,它掌握着名与利对一个人是福是祸的密码。道德品质的高尚与卑下,首要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与他人、集体、国家的关系。“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为极端个人主义。名利之于这类人,作用不外是助纣为虐,结果只是欲益反损。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忘我奋斗,名利不争,然美名、利益之类则常常会不期而至。如中国历史上士穷而文工的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龄,他们所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是死后才扬名于世,成为古典文学名著,为后人所称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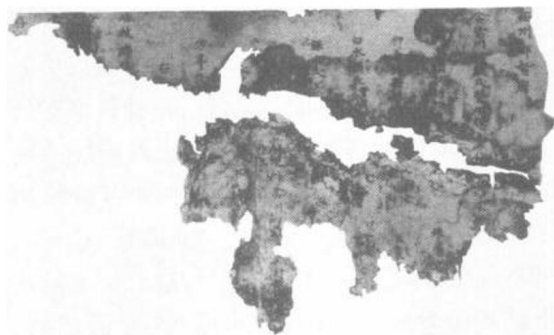
名利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和社会评价的结果,对个人是一种责任引导,对社会是一种进取引导。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名利不应是行为者的出发点,而应是他们履行社会责任的副产品;相反,以个人名利思想作行为引导,着眼于衣锦还乡,封妻荫子,在

世俗社会人前显贵,则难免因誉致毁,求荣取辱,人财两空。所以说,加强修养应首先从无私奉献、淡泊个人名利开始。当然,提倡淡泊个人名利,不是提倡“无为”,而是为了弘扬一种奋发进取的伟大精神,用超越功利的境界致力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诸葛亮在教子书中所说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新时代的内涵。

提倡淡泊名利,对已有所建树的各级官员来说,首先应体现在如何对待荣誉上。有了成绩,首先想到人民的养育之恩和同事们的功劳,不能贪天之功归为一己。在处理事业的长远要求和个人当前功绩的关系上,要反对急功近利,不能干图虚名而招实祸的蠢事。在发展经济中,要划分正当得利和不当得利的界限,坚持取之有道,坚持正当手段和正当目的的统一,坚持对人民群众的少取多予。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他所指的名利当然是羁縻自己的个人名利。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魔鬼靡非斯特给了他很多顶级的俗世享乐诱惑,他却总找不到对生活的满足感。后来,在领导百姓填海造田的事业中,他才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多么美啊,请停留一下!”超越自我的社会成就使他获得了人生最美好的感受。由是观之,淡泊态度与进取精神的统一,平常心与责任感的统一,应该是人们正确对待名利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人们讲名利但不受名利羁縻的惟一途径。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另一种牛缰马络般的信息羁縻正在铺天盖地向人们袭来。先是传呼机,后是手机。它们的出现顷刻间把地球变小,把人的距离拉近,使古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伟大理想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引进手机,使用者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外资公司员工,手机代表了金钱与身份。匆匆十数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手机的持续降价与普及,使它成为庶民阶层的必备。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00年底,全亚

洲的手机数计达 2.09 亿部,中国大陆占 33.5%,约 7000 万部,台湾地区 7.6%;日本则占 27.9%,韩国 14.2%。中国手机数已超过



日本,在亚洲夺冠。传呼机和手机分别在 1949 年和 1951 年为美国的阿尔·格罗斯发明,仅仅半个世纪,这两个发明即风行全球,势不可

《屯田文书》吐鲁番出土的西州都督府文书是唐朝羈縻当。2000 年 12 月 21 日在美国亚利

桑那州太阳城 82 岁的格罗斯与世长辞,他生前对《亚利桑那共和报》记者说,我要是晚生 35 年,拥有这些发明专利的话,比尔·盖茨只能靠边站了。据台湾报纸报道,在台湾,成年人对手机讲究的是收讯效果、故障率低等实用性,还要考虑手机价钱、月租费等等,而青少年不但感到没有手机在手似乎已经落后于时代,且即使有了手机也十分在意其造型,最好是同伴中还没有人用过的新款。在台湾的年轻人中,手机不但是他们相互联络、增进友谊最方便的工具,而且也是所谓新新人类一种炫耀的象征,在“他有,我不能没有”的心态指导下,不惜追求新型号,换机如换衣,为跟上时代潮流。除了央求父母买手机外,也有人向人借用手机以为炫耀,引起纠纷。报载:“台中市日前曾发生高职学生在购买一只新型手机后,借给同学试用,结果手机不慎遗失,除了造成同学反目,还引发其中一方纠众当街持刀砍杀对方的伤害事故。”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少年为了筹资换机,不惜瞒着家长自行外出打工,以致在打工场所结交损友,误入歧途,造成离家、逃学等情形,甚至加入抢劫、盗窃集团。可见先进的手机本来是被人所驾驭的工具,但一旦痴迷

于换机,反而成了羁縻人们的牛缰马络。

在中国,迅猛发展的手机在给人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与社会,这就是继“手机经济学”之后的“手机社会学”。为了面对这种更深刻的变化,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事先做出更多研究与因应。欧美早已发现,自从手机兴起并逐步与网络连结后,一种新形态的人类与价值取向即告出现。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使得传统的属地感情变淡;随着人的流动性增加,即会更要求自由,对风险的接受度也会跟着增加,并有更多求新求变的企图。“手机族”对传统和权威较少敬畏,对财富的认知增强,尤其是通信与信息行业的从业者,俨然已成了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的求新求变与风险倾向,对于社会有着更多的影响力。中国从传统社会快速奔向由手机等现代科技所组成的后现代社会,除了技术及产业问题外,人与社会、文化冲突等问题可能更为重要。手机作为现代的“牛缰马络”正在羁縻中国,从而改变中国,当前我们不仅要研究将会如何改变,而且更要研究如何去面对如此伟大的变革。

佛国春晓

人工智能专家潘云鹤先生与我多次相约,欲造访杭州灵隐寺方丈木鱼大法师,由于各种“忙”的原因,无数次延期,历时半年多方才如愿以偿。2002年2月的一天上午,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尽管立春只过去几天,摄氏15度的气温早已使湖山秀丽的杭州沐浴在如春的温暖之中。当我们沿着浓荫蔽日的灵隐路驱车越过流水潺潺的灵隐溪,抵达北高峰东麓的灵隐寺后门时,原省宗教局的老局长严紫娟女士正陪同云鹤先生和陈卫东秘书漫步在青翠欲滴的灌木丛中、繁花似锦的田间路旁等候我和朱忠明先生一起相聚进寺。

坐落在杭州市城区西北隅飞来峰对面的灵隐寺是中国佛教禅宗名寺,该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五代吴越国鼎盛时期,全寺拥有9楼、18阁、72殿、1300间僧房,逾3000僧众,到南宋理宗时更进一步被朝廷列为天下禅宗五山之二,成为仅次于余杭径山寺的江南著名佛教丛林。康熙皇帝南巡时又赐名“云林禅寺”并亲笔题写了匾额,至今仍高悬在正门门首上方。当我们一行在年轻的知客导引下步入院内时,早已恭候在此的年轻监院(即相当于世俗之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觉乘法师笑容满面地跟我们一一握手致意。接着我们就迎着拂面而来的春风,沿着古树参天、花繁叶茂的坡道向灵隐寺的方丈寮走